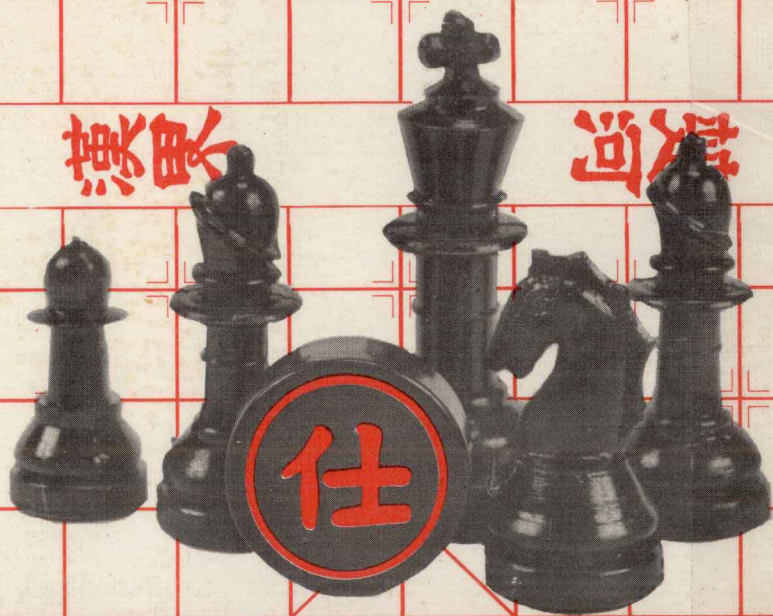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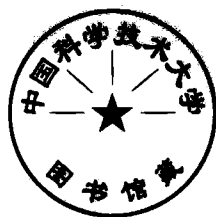


中國知識分子與西方

汪一駒著 梅寅生譯

留學生與近代中國 (1872 ~ 1949)





中國知識份子與西

留學生與近代中國（1872—1949）

楓城叢書之二十八

中國知識份子與西方

留學生與近代中國 (1872~1949)

作 者	汪	一	駒
譯 者	梅	寅	生
發 行 者	廖	文	遠
出 版 者	楓	城	出 版 社
總 經 銷	楓	城	圖 書 供 應 社

新竹市文昌街七十三號

劃撥帳號：104063

電話：(035)222186

臺北聯絡處 廈門街147巷1之42號

電話：(02)3212001

印 刷 者 協林印書館有限公司

定 價 定價 80元 金2.5元 (不含郵資)

初 版 中華民國六十七年十二月

局版臺業字第1322號

發現缺頁、破損、倒裝，請寄回更換

有版權・不准翻印

汪一駒著
梅寅生譯

目 錄

章慕庭序・一

自序・4

陳之邁序・16

戴吳進序・19

譯序・21

圖片・23—38

第一篇 前言

第一章 傳統中國的觀念及中國人・40

第二篇 新士之起源

第二章 自強時期・84

第三章 維新時期・93

第四章 清末民初時代的新教育・107

第五章 民國元年至十六年・123

第六章 民國十七年以後・137

第七章 民國時期的教育・153

第三篇 受到影響的各方面

第八章 嚴復、梁啓超的政治思想・174

第九章 辛亥革命與知識份子・189

第十章 五四運動・227

第十一章 中國教育的特色・237

第十二章 嬗變中的知識界・249

第十三章 國民政府時代的財政・265

第十四章 工程師、企業家、銀行家・289

第十五章 正確的看法・297

中譯重要參考書目・301

附錄・305

後記・309

序

近代中國歷史上，最驚人的現象之一，便是大量的青年出國留學、自本世紀初，每年成百上萬的青年男女，擺脫他們自己的文化囹圄，到日本，美國，西歐和俄國等現代國家，潛心讀書數年。

廿世紀中國知識份子，多半留過學，至少曾受業於留過學的老師，在中國現代化過程中，他們推動了軍事、科技、外交、財政、政治、思想和文學。經過留學這個過程，他們才對中國以外的真象開始適應、如不考慮到西洋教育對中國之影響，便不能了解近代中國。

說來也很奇怪，在本書問世之前，始終沒有一本用西語對這一方面，作一綜合而有系統的研究、汪一駒教授，以豐富的史料，探索留學運動，起自十九世紀末葉，止於廿世紀中季，此書若非詳盡無遺，亦堪稱深入者也。

在這七八十年中，約有十萬學生出國留學，且爲期甚久，他們大多數回國，用

他們的知識，貢獻於中國社會改革，有的飛黃騰達，有的學非所用；更有的利用自己的知識，作個人權勢之擴張，他們對自己的社會，曾起過什麼作用？

爲使如此複雜錯綜的問題，具有連貫性，作者採用了社會歷史學，統計，描述，和傳記等方法，予以處理。留學生在中國近代史上，多爲政治革命的領袖，社會改革的導師，有掌管支度的巨卿，有思想家，文化倡導人，和企業家。作者所探討的，正是中國近代史上，最被忽略的問題，作者最終的目的，在評估這個大規模的留學運動對中國的影響，由中國在本世紀所遭受痛苦的文化調整來看，若某些結論不太樂觀，似亦不爲過。

領導人一部份的教育是在外國所接受，因而他們不能防止這種文化上的混亂；實際上，這種混亂正由他們所造成。

大體而言，中國人口多數爲農民，而留學生却忽略了中國農村問題，這是外國教育之過或是外國教育之結果？外國教育一般說來，不適合中國之需要？這種騷動，難道是現代化不可避免的副產物？

日本似未遇到這種損傷性的經歷，此外是什麼因素影響了中國？上述問題中，

有些正是作者致力之所在。這些問題並非僅對中國有其意義，現在世界上，大多數的國家，正處於舊習已被破壞，衝突到處可見的現代化過程中。

數以千計的亞非青年男女，正在美國，西歐，俄國和中國留學，極想增加他們的知識，希望對自己的國家現代化，有所貢獻，而他們的留學教育，和吸取的衝突思想，對他們和他們的國家，利耶？弊耶？知識移植，信仰移植，和技術移植，必定產生社會混亂乎？

美國青年留學的人數，亦與日俱增，那麼多未來世界領導者，正在接受的都是兩種文化以上的教育，而未來的史學家，在評定這種教育上，其看法為何？

作者對中國歷史上的事例，所作的研究，並無意來解答上述問題中後面的幾個問題，確情有可原，因為他已開拓了一個影響着人類五分之一的重要領域。

汪著不僅對中國學生引以為訓，對現代世界上關心教育的人士，亦有足多者。

哥倫比亞大學中國史學教授 韋慕庭 (C. Martin Wilbur)

一九六五、十月

自序

本書宗旨，蓋有多端，其犖犖大者，厥爲描寫中國留學之起源，及發展期間之環境；論述留學生在國外及回國後之成就；並估量留學生對中國社會及政府發生之影響。較顯明的宗旨，在闡明當某一社會，在傳統上根深蒂固，欲掙脫習性的桎梏，在短期內適應一個全然不同的生活方式，而引起的問題。

作者心目中的讀者，不包括漢學家，故偶亦鉞及中國歷史上有名的史實。其目的在使對中國歷史，不甚了了之讀者，更易明白。

知識份子 (intellectuals) 一詞，用來指工業社會中一定的團體，難予界說，而用來指中國的「士」，其意義至爲明確，蓋率指「受過教育者」，以別於未受過教育的民衆，認定此一事實，我們或可說，「高等」「低等」知識份子，表示受過正式教育之多寡。

知識份子一詞既有了現代的含義，作者用來專指廿世紀的中國讀書人，另以文

人 (Litterati) 一詞，泛指廿世紀以前受過教育者。

中國的「士」負有維護傳統道德價值，和留意朝政的雙重任務。作者認為，中國社會中的上層，咸由學者所組成，有如次篇所述，因為他們位居要津，深感在十九世紀中，西方文化滲透中國的影響。這種情形，在中國史無前例，「士」提供了危機的徵候，和中國社會改革的目標，研究嬗變中的知識界 (intelligentsia)，無論其方法如何，似不失為瞭解近代中國之關鍵。

主題範疇在敘述上，導致不少實際問題；首先，說到留學生，就想到他們共有的通性，可以爲了討論而予以孤立，這一點在中國已受到普遍承認，尚無異議者。然而，觀察一件孤立的事例，和爲了因果關係的討論而予以孤立，則迥然不同，不過作者的研究的範圍，解決了這個困難。

幾乎所有研究交互文化教育者，皆爲人類學或社會學家，他們關懷個人，是把個人視爲團體中之一份子，並非無團體的各個人。後者討論中國留學運動，是視之爲團體現象，同時也敘述受過外國教育的中國人對中國的影響。如此，便很自然地，造成篇裁問題；除首篇前言外，主要的兩篇，結構不同，彼此也不够關聯；次

篇是真實而客觀的「社會學者」的研究；第三篇爲留學成敗，較主觀的分析，兩篇既不能縮成一致性的一篇，也不能將第三篇，細分爲一系列的專論。

每種方法各有其局限，若用第一個方法，必定割捨與主題有關的一些資料，如用後者，則因詳述細節，而犧牲了全般動向的瞭解。作者認爲，仍以本書所採用者爲善，或可得窺見新的歷史正確關係最可能之途徑。倘作者的嚐試有拋磚引玉之功，何其樂耶！

另外，幾個方法論上的問題，應予提出；第一，在某些事例中，和留學生關係甚微，但亦必敘及，如第九章所討論的辛亥革命，便是一例，據作者所知，至今用英文寫的，而且適當的辛亥革命史尙付闕如，辛亥之役本身還未完全明白，很難概括論起義者的角色。大多數的作家，皆有過份強調他們爲英雄人物的傾向，余甚疑焉，以此例而言，最好全般敘述，讓讀者自己去評判起義者的各個人，似有勝於集中討論一個問題，或一位人物，此爲作者所偏好也。

其次，有些留學生，回國後也頗有影響力，但未明白地納入分析，顯然，每位作者，必受其個人好惡，能力，和史料之可得性的限制。如果作者可以對特別未納

入書中論列者表示意見，作者首先指出，民國時代外交留下的資料太貧乏了，而他們不願留下私人記述，事非尋常，筆者對此罕有現象，曾著文論述（註一），希望有一天政府檔案開放（註二），有關中國外交官較多的資料得聞於世。現在，作者認為，僅止外交技巧勝任的外交家，皆和中國文化傳統脫了節，這些位受過西方教育者，既然如此，將他們略而不論，當不致影響作者的總結論。

軍人也略而不論，雖然他們在日本受訓，真能說日語者殊鮮，能吸取皮毛以上的日本文化者，則屬鳳毛麟角，在此情況之下，他們的眼界，較諸國內受訓者，五十步與百步而已。

未納入書中討論的另一批，是職業性的政治工作者，他們實在可以另成重要的一篇，因史料極端缺乏而作罷。

中國人一提到西方，主要地，便想到英美，其次為德、法、比、諸國，至於日本，不屬此一地帶，甚至和這一帶，也不相隣接，僅是從這一地帶至中國間之的半路上一個客棧而已。

讀者或質疑，我就道德傳統之士，和因西方教育而產生的，新的而不能以道德

標準來評判的士，其間的尖銳比照，約言之，有以下三事：(一)傳統的士，是否真是道德；(二)新的士，是否不能以道德標準評判；(三)果爾，西方教育是否為因素之一，以上三項，尤以(一)(三)最可能引起爭議；主要因為近五十年來，中國社會環境起了變化，譴責傳統的禮法，並將士大夫描寫成農民的剝削者已翕然成風，其流傳之廣，以致常被認為真，可是作者曾目睹若干較完整的證跡，證明此一指責，這確是不易解答的問題。

慎審的調查，至少需要就士大夫所犯的弊端，對照他們對社會所提供的服務，來個結算，若採用這個步驟，全盤看來，也不能明白地就是對他們不利，一則，中國文化的整體，由地方志至諸代史中，皆有由士創立功績的記述，除非有人持極端的見解，而謂各項報告失實，祇是為了統治階級的利益，才得流傳至今。要想瞭解這些士，何以被描寫成農民的貪婪剝削者，殊非易事，尤有進者，在任何社會研究中，必需瞭解制度背後之意義。

中國所有的社會結構，始終朝一個總目標進行——自童年即灌輸儒家價值；嚴斥異常的行為；強調個人對家庭包括祖先和後代的責任；缺乏流動性，因而死守鄉

里；缺乏創新，和刺激消費者需要的商人，以上和其他因素，形成了中國人的羣性，也減低了進取的本能。

設非有人認為，人之惡性不受環境之影響，那就難以明白，何以傳統的士，竟未響應他們當時文化的呼籲。中國士農間之關係深遠，亦世界上最悠久制度之一，單就其關係悠久來看，足令人懷疑士何以被一個階級利用，而來剝削另一個階段。

與此說相反的，我們僅自農村獲致些雜亂的報告，指述一九四九年前數十年，農民深受地主之勒索（註三）縱使這些報告是事實也未誇張，而能從中引出何種程度的一般性結論仍屬疑問。何況，完善的方法論，不許我們將現在推入過去，因為廣泛改變的社會環境，一九四九年的地主，和一八〇〇年的地主，相同之處極少，所以極少證據反駁傳統的觀點——學者曾為人民服務，也曾為他們執行過有益的職責。

除書中敘及的證據外，或應提出較廣泛的考慮，證明在近代中國，實有不能以道德標準評判的士，並非子虛，第一，不能以道德標準評判，在現代社會中，乃一無可避免的趨向，嚴格的道德方向，始終是宗教的或知識份子的標幟並非一心為大

量生產百姓的文化特徵。

由於生活更趨多元化，道德感不再是生活中唯一的，或最爲人關懷的事。而且，專門化導致更高的技術和生產能量，個人相對地，也要受更多的技術訓練，因而，剩下的時間，不足以作富有哲理性的沉思，此乃實情。當中國邁向工業化時，此說亦適用之，尤其是講道德，其先決條件要有道德律，近代中國似乎缺乏生活上遵守的道德律，因爲在五四運動中，懷疑儒家學說，中國的知識界，陷入了道德和倫理真空的階段。

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是唯一的教言，祇是三民主義政治性多於倫理性。中國人的生活中，於是缺乏作爲價值標準的東西，在那種情況之下，幾乎難以想像，知識界猶如先賢們，會有同樣的道德熱情。

至於留學生，情況猶差，雖然，西洋文明，基本上，和中國文明一樣，皆沉浸於精神價值中，但是中國人對西洋的文明頗難吸取，一則，基督教義與中國文化欠調和，對多數中國人缺乏吸引力，而且，西方世俗價值，一般而論頗爲含蓄，在大學或大學以上階段，並不明白地教授，而且，世俗價值，當喪失了當時社會制度

之支持後，也多了無意義。

外國學生當然缺乏唯有自出生，或自童年時代，始可得到的文化親切感，他們在留學國的社會經驗亦有限，而認真求知的學生，被那種文化障礙逼得埋頭讀書，他們的功課，通常是高等技術性的，專心讀書祇有使他們，對生活更抱孤立的態度，處境如此，外來者較一個在工業社會中土生土長者，越發不能以道德標準評判了。

這種「誇大」的對外國人的影響，指出了語意學上的困難。當我們說；某一中國人「西化了」，並不意味着，這位中國人已經真的變成了西洋人。相反地，是指因為其西方經驗，他已經脫離了中國的典範，換言之，西化的結果很可以說是一種行為式樣，多少帶點中西文化痕跡，但却又不中不西，而又易於引起混淆和誤解，於是論者各依偏見逞說；對中國文化不滿的，主張中國學生更加西化；對西洋懷有惡意的，則贊成反其道而行。

若將「西化」二字，加以廓清來指隨文化接觸而起的變化，則雙方之爭議便息。